

社会主义五百年 〔第三卷〕


社会主义在中国

1919—1965

于幼军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

社会主义在中国

1919—1965

于幼军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州·

目 录

- 第一回 十月革命炮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北李南陈相约 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 1
- 第二回 纲领应有高低 展宏图需从国情出发
革命须分两步 共产党明晰任务目标 25
- 第三回 多年奋斗未果 永丰舰悔筹谋失策
决意联俄容共 孙中山觅组党良方 40
- 第四回 联合战线筑就 国民革命风起云涌
一代巨星陨落 伟人业绩山高水长 57
- 第五回 浦江风云突变 蒋介石举起屠刀
鲜血擦亮眼睛 枪杆子打出政权 74
- 第六回 农村包围城市 井冈道路通天下
军队效力人民 星星之火可燎原 98
- 第七回 反对教条主义 思想路线正航向
探索苏区新政 人民共和见雏形 119
- 第八回 王明决策极左 中国革命误入歧途
博古指挥胡乱 苏区红军濒于绝境 135
- 第九回 遵义航向拨正 力挽狂澜于既倒
红军铁流万里 锻造民族之脊梁 155
- 第十回 张杨奋起兵谏 西安事变惊环宇
张毛力促和解 国共携手赴国难 176
- 第十一回 全民同仇敌忾 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
中共深明大义 化解危局饮誉国内海外 196
-

第十二回	润之潜心耕耘 陕甘起步试验	终成新民主主义理论 探索人民共和国模式	214
第十三回	顺应历史潮流 协商民主建国	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 众党派订立《共同纲领》	237
第十四回	医治战争创伤 推行土地改革	新民主主义蓝图铺展 耕者有其田梦想成真	259
第十五回	选择与苏结盟 实施一五计划	外交方针一边倒 经济社会百事新	278
第十六回	过早起步过渡 过急过快推进	总路线取代《共同纲领》 超高速完成“三大改造”	295
第十七回	痛批个人崇拜 大兴调查研究	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 中共八大探索建设新路	319
第十八回	整风急转反右 斗争失去法度	雷霆震怒出重拳 千倍扩大实离谱	336
第十九回	反冒进循正轨 大跃进演闹剧	头脑清醒令步伐稳健 主观狂热致梦想成空	356
第二十回	公社化硬超前 共产风乱神州	劳民伤财罹患沉疴 民心离散教训深重	371
第二十一回	庐山风云突变 反右狂飙再起	纠左急转反右竟在一夜间 无辜蒙冤受难何止百万众	387
第二十二回	客观规律无情 实事求是有道	三年跃进跌入深渊 八字方针走出困境	410
第二十三回	高调反修防修 强化阶级斗争	“四清运动”整肃党内走资派 新创理论隐伏“文化大革命”	429
主要参考书目			452
后记			459

第一回

十月革命炮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北李南陈相约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话说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集结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和热血青年，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猛烈冲击。恰在此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犹如漆黑夜空一道闪电，震撼了中国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心灵；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是给正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行者们，送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崭新思想武器，促使他们以崭新的视野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在新的斗争实践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毅然创建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

1919年6月11日下午，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人潮如涌，热闹嘈杂。在一僻静茶室的靠墙角处，三位教授学者装束的人在喝茶聊天。突然，其中一位头戴礼帽、身着白西装的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从上衣怀里拿出一沓传单向周围茶桌散发。传单标题为“北京市民宣言”，内容有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项要求。顿时，茶房热闹起来，茶客们争相阅读传单，有人面露惊诧，有人大声叫好。

三人相视而笑，起身离开茶室。时天色已晚，三人中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和高一涵与中年男子握别，那中年男子则继续在游艺场各处游逛。晚上十时许，他来到游艺场楼顶花园，看见下一层露台正在放映电影，就拿出一卷传单从上面撒了下去。他转身离开刚走几步，就被两个警察抓住。

中年男子被押到警察局，一名警官开堂审讯，拍桌喝问：“姓

名？”

中年男子神情自若，冷冷答道：“陈独秀。”

警官一听心里打了个颤，这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于是便放低声调问道：“可是北京大学的陈独秀？”

陈独秀傲然道：“正是。”

警官愣了一下说：“为何在公共场所散发过激言论的传单？前一阵学生的不法行为是不是受你指使？”警官所指斥的“不法”行为，显然是指五四爱国运动。

陈独秀大义凛然：“何为过激？何为不法？难道爱国是过激？救国是不法？”

警官无言以对，他心中暗忖：这陈独秀是个名人，还是报上去由上司审理，别给自己惹麻烦。于是对手下人说：“先把此人关进监狱，听候处置。”

在狱中，陈独秀面对铁窗心潮起伏，回顾反思自己这些年走过的道路，审视当下时局与革命形势。

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后，陈独秀东渡日本，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积极参加留学生革命活动。回国后，他先是在家乡安徽创办报纸，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后建立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安徽和浙江的革命斗争。安徽光复后，他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推行激烈的改革措施，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而受挫，后来参加安徽地区的反袁世凯斗争又告失败。

那时的陈独秀陷入困惑和苦闷。救国救民之路究竟在何方？不学西方没有出路——洪秀全想走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之路，失败了；义和团凭借封建迷信和人多势众，抵抗不了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可是想学西方又学不成——洋务运动以为师夷长技可制夷，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工业可以强国制胜，结果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企图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改良封建统治制度，也失败了；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推翻了封建王朝，祈望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的共和制度，结果革命成果被军阀篡夺，所建立的共和国名

不副实；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时期，国内一些学者、思想家，轮番传播和介绍从西方引进来的各种主义、思潮，进行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实验，结果都一一草草收场，引不起国人注意。救国救民的根本之道在何方？他冥思苦想，终于豁然开朗：中国的出路，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和文化的转化，有了新文化，才能有新国民、新社会，新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实行和巩固。



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怀揣这一理想抱负，陈独秀全力投入思想文化战场。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改名为《新青年》），由此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兼容并蓄，延揽全国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了编辑部并充任主要撰稿人。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就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其目的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

想到这里，陈独秀不禁摇头苦笑。原以为从西方国家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却被现实击得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弊端突出暴露，引起国人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特别是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拒绝同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合理要求，如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取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等，而且还竟然作出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老师”一再欺负“学生”，给国人以彻底

打击。西方之梦已破灭，新的道路在哪里？陈独秀不由想起了挚友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提出走俄国人路的主张，这条路行得通吗？陈独秀陷入深深的沉思。

如同陈独秀一样，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命运，孜孜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纷纷撰写文章、著书立说、创办刊物或建立社团，热衷于研究、介绍和传播国外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那时的中国，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鼓吹新思潮的报刊如同雨后春笋，一下子冒出来四百多种；新成立的各种社团组织数不胜数，仅北京在1919年注册成立的社团就有281个。

在进行社会改造的方式、道路问题上，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议，主要有三类主张：第一类主张继续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暴露出不少弊端，但仍然是比中国更为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第二类主张中西合璧，企图寻求一种由中国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的物质文明互补、化合而成的新文明。但究竟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们或者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或者又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路上去。第三类则力主效法苏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第三类主张日渐成为当时中国新思潮的主流。

然而，当时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五光十色。其中既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形形色色自称或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等。面对众多的“社会主义”，大多数进步青年弄不清楚哪一种才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妙药，只是对社会主义抱着朦胧的向往摸索前行。

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并凭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示范作用，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思想学说和社会理想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建立起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新型国家，给正在黑暗中摸索徘徊的中国人民，尤其是一批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方向、道路和方法的启迪，使他们看到了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1919年7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废弃沙俄过去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更是使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大喜过望，奔走相告。^①这一重大事件对于苏俄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



李大钊，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接受。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学习的播火者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通过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译作，阅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同是领军和核心人物，当时流传一首嵌名诗盛赞两人曰：“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李大钊曾用笔名“孤松”。）

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年，李大钊即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指出如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俄国革命的发展必然要影响中国革命。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中，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坚定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并满怀激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① 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苏俄政府这一宣言的有关承诺并没有兑现，沙俄政府与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直未能废除。

1919年10月至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在文中指出，马克思的“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在提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等重要思想的同时，明确指出不能简单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搬来中国，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李大钊这几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李大钊学识渊博，思想深刻，又待人诚恳温厚，善于与人交往，是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的良师益友。他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常常是高朋满座，成了北京及南来北往进步青年高谈阔论、讨论争辩的场所，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也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之地。

本系列书上一卷后几回已述，除李大钊、陈独秀外，李达、杨匏安、陈望道等几位留学日本的青年，也积极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在报刊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高君宇、恽代英、李汉俊、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批五四运动的骨干，在参加革命实践和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投身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人，也逐渐实现思想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批由五四运动风云人物成长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位杰出的湖南才俊，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他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般实人家。孩提读私塾时，他就对历史产生兴趣，爱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少年时表现出叛逆反抗性格，曾因与父亲发生争执以跳下水塘自杀相威胁，还因与老师发生冲突而“罢课”躲进山里。少年时代他受

母亲影响，对佛教产生朦胧信仰。17岁他离开故乡到外地求学时给父亲留下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足见少年毛泽东心气颇高、志存高远。在湘乡、长沙新式学堂读书期间，毛泽东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和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颇大，曾写了一篇文章贴在校园的墙上，提出应由孙中山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半年后结束军旅生涯继续求学。1913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该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学校受到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的湖湘学派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勤修哲学、伦理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关心时局，喜谈政治，热心社会活动，组办工人夜校，利用假期到各地游学，了解风土人情，结交各色人等。每逢假日，他邀上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经常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聚会畅谈，可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1918年4月，他和萧子升、蔡和森、罗章龙、何叔衡等人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人心风俗”为宗旨，团结一批进步青年读书和研究问题。师范学校毕业后，毛泽东来到北京，经恩师杨昌济教授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这段时间，他参加北大的新闻学会、哲学研究会等活动，广泛结交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学者和怀抱救国救民理想的热血青年，特别是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十月革命的情况和经验，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

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回到长沙，成为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他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撰写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切磋交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之办法。1920年他又到上海与陈独秀等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湖南革命运动等问题，陈独秀向他赠送了陈望道刚刚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

史》等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思想文化风起云涌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动，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后来又伴随清朝官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兴起而逐步发展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加上各种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商业和金融业的职工等等，无产阶级人数已达4000万左右。

工人阶级当时虽然只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且比较年轻，文化水平低，但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富有组织纪律性；深受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革命性强。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刚刚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就显示其力量的强大。从1919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一周之内参加罢工的企业五十多个，工人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相继罢工，并迅速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座城市，使五四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为工人，其声势更为浩大，影响更为深远。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成长，无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这一切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条件。然而，谁来担当建党的重任呢？时代呼唤擎旗手。

当时，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的北洋军阀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甚为惊恐。他们攻击谩骂社会主义是“邪说横行，其祸甚于洪水猛兽”，查禁销毁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印刷品，惩治迫害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过激党人”。陈独秀被警察局抓捕关押后，李大钊等人人为之奔走呼号，策动新闻媒体及社会团体、大学教师、学生等呼吁营救，孙中山也在南方就此发话抨击北洋政府。

迫于社会舆论压力，1919年9月，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患胃病为由保释陈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斗志更旺，在其主编的《新青年》上连续发表系列文章，指责已被北洋军阀篡权夺政的“共和政治归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宣称“要反对既有的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政治”，“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改造社会”，建设“新时代、新社会”；等等。这段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斗争实践，使陈独秀由五四运动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成长为中国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

1920年2月的一天傍晚，陈独秀应湖北学生联合会之邀去汉口讲学后乘火车回到北京。他刚进家门坐下休息，一名警察就敲门进屋问话。陈独秀觉得事有蹊跷，待警察离去后立即拿上随身用品，先去了胡适家，后又转到李大钊家。

李大钊一见陈独秀就说：“我正担心你出事呢。你在武汉演讲的消息已登报，听说警察署又要把你抓起来，我们非常着急，派人到车站接你又没有接上。”

陈独秀将他回家遇到警察上门的事说了一遍。李大钊听后忧虑地说：“仲甫，北京待不下去了，想法子到南方去吧。”

“我也这样想，只是现在乘火车和汽车怕是不行了。警察想必在车站布置了人。”陈独秀答道。

李大钊想了一会说：“我想办法送你到天津，你再从天津乘外国人的船去上海吧。”

李大钊找人雇来一辆骡车，陈独秀戴顶毡帽，穿上从厨师那里借来的一件油乎乎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则扮成生意人，两人连夜乘骡车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而去。

中途，他们找了家小旅店住下，两人进房坐下聊了起来。陈独秀说：“守常啊，我这一段一直在考虑，以前我们只是进行思想启蒙，现在是要改造社会，仅仅靠办刊物、教学、讲演和写文章怕是不行了。”

李大钊点点头：“是啊，我们恐怕要更多地到民众中去，与民众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也走俄国人的路，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你以为如何？”

陈独秀接着说：“你一直说要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我到现在是彻底赞成。我原来一向是反对组党，也曾《〈新青年〉宣言》中称永远不会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可是，苏俄式的政党正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我说过不加入政党，但我并没说过不发起组织一个自己信仰的党。”

李大钊心中一喜，哈哈大笑道：“那就让我们一起去建立有自己信仰的党。”

陈独秀深表赞同，接着说：“我们立即着手把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一个团体，逐步发展成一个代表多数人的政党，领导民众运动以改造社会。我一到上海就办这件事，你在北京同时进行，如何？”

李大钊高兴地说：“好啊，我回去马上找一些人，首先搞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把对马克思学说有兴趣的人联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之政治经济情形研究得不够，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尚需做足，另一方面以这种形式活动当局也不好干涉。”

陈独秀高兴地说：“好，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只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要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以前人们说我们是‘北李南陈’，那是指思想和学术方面，看来今后‘北李南陈’真要携手干一番大事了！”

言毕，两人纵声大笑。一个开天辟地、深刻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改变几亿中国人命运的伟大构想就这样形成了。

李大钊在天津送别陈独秀回到北京，立即联络一批有志青年，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建了我国最早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有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人，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开始

了组建政党的准备工作。

2月中旬，陈独秀到达上海，住进了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他常常在家里约请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恳谈，不时前往工厂、商店了解工人状况，与上海工界团体广泛接触，创办面向工人群众的杂志。很快，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一批热心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如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定一，民国日报社的邵力子，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即茅盾），以及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人。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商议建立社会主义组织。

就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时，共产国际将眼光投向中国。欧洲多国革命失败后，列宁和俄共（布）把目光转向东方，制定了东方战略——在东方几个国家推动建立共产党组织或寻找合作者，除宣传共产主义，输出革命，还可配合苏俄国家战略，确保其远东边境地区的安全及利益。1920年春，经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到了中国。他此行的目的是出于维护苏俄在远东地区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希望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他们开始是想选择、扶持一两个开明军阀，后又找到了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在中国推动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还在上海等几个城市设立了联络机构。

维经斯基是俄罗斯人，十月革命前流亡美国做工和读书，后回国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俄国共产党。1920年4月，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杨明斋（山东人，具俄共党籍）来到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员鲍立维介绍，维经斯基等人拜访了李大钊，多次与李大钊促膝深谈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等问题。两人相谈甚洽，情投意合。接着，维经斯基又持李大钊的介绍信，到上海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

拜访陈独秀，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建议，谈到在中国建党，两人一拍即合。其实，两三个月前，陈独秀已与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商议组建政党事宜，初步达成了共识。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一批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依托研究会加紧进行筹建政党工作。7月间，陈独秀与李汉俊、沈定一等人商议筹建政党，开始考虑以“社会党”命名新党，陈独秀专门为此事征询并采纳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名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陈独秀任书记，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俞秀松等人。随后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三十多人。

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九人为第一批成员。随后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邓中夏、李实、何孟雄、缪伯英、罗汉等四十多人为第一批团员。两个月后，共产党北京小组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上海、北京中共早期组织建立后，李大钊、陈独秀按商定分工，分头在北方、南方地区推动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北方地区，李大钊派北京小组陈为人到济南，联络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于1921年春在济南成立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党组织吸收唐山铁路工人邓培、梁鹏万参加，派其在唐山及华北铁路开展活动。

在南方地区，陈独秀派李汉俊、刘伯垂到武汉，联络并推动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林育南、项英等人于1920年8月建立了“共产党武汉支部”，推选包惠僧为书记。随后，又组建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恽代英、萧楚女、李书渠、李求实、刘昌群等人为第一批团员。

陈独秀还写信给湖南的毛泽东，鼓励其发起建立湖南共产主义组织。毛泽东与何叔衡积极活动，于1920年11月在长沙成立共产主义小

组，成员有夏曦、易礼容、郭亮等人。同时成立了有三十多名成员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于次年1月成立广东共产党组织，同时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为第一批团员。

此外，旅居日本的施存统和周佛海在东京建立起由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组成的共产党组织，远在法国巴黎留学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等人也组建了同样的共产主义小组。天津、安徽、浙江、四川、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等地区均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人数各在二三十人左右。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大多数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各地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除了积极创办或续办报纸杂志，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利用学校讲坛和各种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外，还响亮地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组织成员到工厂去，到群众中去，自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

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在北京、上海出席工人集会，发表演讲，启发、鼓励工人们迅速觉悟和行动起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社会的主人。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党小组成员和青年团员，纷纷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人服，到工厂做工，与工人打成一片；利用办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自行捐资或筹资在工矿区举办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帮助工人学文化，普及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帮助工人成立工会或工人俱乐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很快就开创了工人运动新局面。

到了1921年6月初，上海的李达、李汉俊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书信商议，认为各地建党工作已经起步，建党时机日臻成熟，便发函商请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组建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相约是年6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